

高教信息

2026 年第 9 期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编

2026 年 9 月 20 日

● 教育资讯

- 《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印发..... (1)
- 全国高校博士点统计出炉 (1)
- 多所高校推出“博士+硕士”双学位项目培养跨学科复合型人才 (3)

● 实践案例

-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多维联动 以学科建设推动学校高质量发展 (5)
- 武汉工程大学：依托地方资源打造特色学科高峰..... (7)
- 四川轻化工大学：学科特区模式攻坚博士点..... (9)
- 宁波大学：扎根区域 学科登峰与博士点扩容双突破..... (10)

● 理论研究

- 博士点授权体制改革与地方高水平大学发展..... (13)
- 新质生产力背景下高校学科专业优化调整：价值遵循、实践困境与推进路径..... (19)

● 高教视点

- “顶天立地”设置调整高校学科专业..... (29)
- 高校学科专业调整不能只做“加减法” (31)

《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印发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分类推进高校改革作出系统部署。

《意见》指出，分类推进高校改革，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顺应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发展特征和学龄人口变化趋势，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协同育人，以统筹规划为先导、以分类改革为动力、以科学评价为牵引，构建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加快建设教育强国。

《意见》指出，要优化分类布局结构。科学构建高校分类发展体系，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确立高校分类框架，根据隶属关系建立多元适配的高校分类模式；统筹中央部门所属高校和地方高校协同发展；统筹高等教育资源布局；统筹完善人才培养结构；统筹用好国际国内资源。

《意见》指出，要激发分类发展动能。打造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支撑力量，发挥好“双一流”建设对研究型大学改革的牵引作用；建强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基础力量，实施优质特色应用型本科院校和学科专业建设工程，优化实施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夯实服务行业创新发展支点力量，发挥行业特色高校传统优势，强化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构建高等教育融合发展新形态，探索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

《意见》指出，要健全分类发展机制。完善高校科学设置机制，强化国家顶层设计、宏观指导；建立高校分类管理机制，推动形成与高校分类发展相适应的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构建高校分类评价机制，构建多赛道、多主体的评价体系；健全资源配置激励机制；强化人才供需适配机制，完善以国家战略需求为牵引的学科专业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

《意见》强调，要加强组织实施，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全过程各方面，全面加强高校党的建设，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切实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稳妥推进改革，合理引导预期，营造良好氛围。（本文摘自教育部网站，2026年9月20日）

全国高校博士点统计出炉

获得博士学位授权资格向来是高校谋求提档进位的标志性事件，博士点是高校争取资源投入、吸引优秀人才的重要载体。在各地日益重视引才的当下，博士学位授权高校（简称“博士点高校”）和博士点的数量愈加成为衡量一个地区/城市、一所高校综合实力的重要参照。

另一方面，学科建设与区域发展需求紧密相关。区域内现有博士点的分布，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下一轮博士点获批的结果。

本文对各省市拥有的博士点高校情况、各高校的一级学科博士点情况、各一级学科博士点分布情况等进行梳理，以供大家了解当下的博士点资源分布情况与发展趋势。

从省级行政区域看，全国 31 个省份均有博士点高校，但区域分布呈现比较明显的不均衡性。

四大直辖市共拥有 96 所博士点高校，这其中，北京市（49 所）占据了半壁江山，博士点高校数全国第一。

江苏、上海高教资源丰富，分别拥有 28 所、24 所博士点高校，位列全国前三。广东、陕西、辽宁、山东拥有的博士点高校数也在 20 个及以上。

博士点高校比例最高的省市均为直辖市和西部省份，占比高于 60% 的有西藏、北京、上海、青海。博士点高校比例最低的是河南、河北，两省各自有近 60 所普通本科高校，而博士点高校数仅有 11 所，占比低于 20%，博士学位授权高校和博士点数量，亟待突破。

此外，有超过一半的博士点高校位于 27 个省会城市，总量达到 225 所高校，显示出优质高等教育资源高度集中的特点。甘肃、青海、宁夏、海南的博士点高校全部位于省会，云南昆明、湖北武汉、山西太原、贵州贵阳、陕西西安、黑龙江哈尔滨的博士点高校数量，占本省所有博士点高校数量的 80% 以上。

60% 的博士点高校，集中在 29 个城市

当前，我国普通本科院校中所开设的本科专业总数超过 6 万个，而在学术型一级学科硕士点、一级学科博士点数量上，却只有约 1 万个和 4 千个左右，可见学校拥有一级学科博士点意味着在全国拥有相同学科专业的高校中占据金字塔塔尖的位置。

高等教育的资源布局和办学水平，一定程度上受到当地经济发展的影响。2025 年，内地已有 29 个城市 GDP 突破万亿元。这些城市，拥有的博士点高校总数共 249 所，共占据了国内博士点高校总数的 60%。

值得注意的是，东莞虽然是“万亿俱乐部”的成员，但截至 2025 年还未有一所高校拥有博士点。不过这种局面，有望在 2026 年学位授权审核中被打破。据悉，东莞理工学院当前已选定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土木工程及资源与环境这三个学科，作为学校首批冲刺博士点授权的重点学科梯队。

“双一流”高校，博士点数量和精度双高

具体到高校层面，我国高校的博士点建设现状如何呢？本文综合一级学科博士点数量与精度两个维度，分别对“双一流”高校、非“双一流”高校的一级学科博士点进行统计，以期反映不同层次高校学科建设的情况。

“双一流”高校的一级学科博士点建设水平整体较高，部分高校博士点数量和精度达到双高。

从数量上看，中山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武汉大学、

四川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山东大学、吉林大学 10 所高校的一级学科博士点数量超过 50 个。

从精度来看，近 100 所“双一流”高校的一级学科博士点精度在 50%以上。浙江大学、北京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等 10 所高校的博士点精度为 100%。一级学科博士点精度超过 90%的“双一流”高校中，南方科技大学特别令人关注。南科大拥有 14 个一级学科博士点，其博士点精度高达 93%。这所年轻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以“小而精”学科布局，高层次人才培养能力位居全国前列。

非“双一流”高校中，极少数高校的一级学科博士点数超过 15 个，博士点精度在 50%以上的仅 55 所。

一级学科博士点数量最多的是深圳大学，超过 20 个。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福建师范大学、扬州大学、河北大学、昆明理工大学、山东师范大学、浙江工业大学、青岛大学、江苏大学的一级学科博士点数量超过 15 个。

10 所高校的一级学科博士点精度达到 100%，包括西湖大学和部分艺术类、体育类高校。精度在 80%以上的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哈尔滨医科大学，学科建设水平突出。

各一级学科博士点的数量和密度

一所高校要获批博士点，需要在申报材料中论证自己获批该博士点的必要性以及不可替代性。简而言之，就是本地区拥有的各学科博士点数量如何？是否满足当地发展需求？高质量发展需要什么学科的博士点等。因此，分学科分析博士点的布局，对于高校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从各一级学科博士点的数量上来看，数量超过 100 的学科有 9 个，分别是数学、生物学、材料科学与工程、机械工程、化学、管理科学与工程、马克思主义理论、物理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从各一级学科博士点（博士点数量/硕士点数量）的密度上来看，全国高校中各一级学科博士点密度平均值在 40%左右。其中密度最高的是林业工程，为 92%。（本文摘自高绩微信公众号，2026 年 5 月 25 日）

多所高校推出“博士+硕士”双学位项目培养跨学科复合型人才

今年 4 月开始，多所高校相继启动“博士+硕士”双学位项目，面向优势学科在读博士生择优遴选，鼓励修读人工智能等专业硕士学位。项目坚持少而精、重质量，配备跨学科导师团队，旨在打破学科壁垒，培养适配国家战略与产业升级需求、具备跨学科研究与实践能力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体现我国高校人才培养从学科中心向问题导向转变的新趋势。

去年底，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印发《“博士+硕士”双学位项目试点设置管理办法》，提出由试点高校自主设置“博士+硕士”双学位项目，支持项目学生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同时攻读另一个学科专业的硕士学位。

读了博士再读一个硕士学位，对人才培养来说意味着什么？

高校优中选优，鼓励博士生修读人工智能硕士

山东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韩勃介绍，今年，山东大学首次开设的“博士+硕士”双学位项目，也将从学科交叉中心的这140名博士研究生中进行遴选。对学有余力、创新能力强的学生，每年遴选约10名学生参加双学位项目，让其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同时，再获得一个其他学科的硕士学位。

“少而精”，重质量，是探索开展“博士+硕士”双学位项目的关键。韩勃介绍，对于这些优中选优的复合型人才，学校也配备了高标准的教学团队。每年遴选约40个交叉导师团队，每个交叉团队由3—4名来自不同学科的导师组成，瞄准关键跨学科跨领域的科学问题。

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印发的《“博士+硕士”双学位项目试点设置管理办法》，双学位项目需要围绕科技发展、产业变革、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等重大需求，培养具备跨学科视野、具有较强学科交叉研究和转化应用实践能力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在已公示的项目中，多所高校鼓励博士生修读人工智能专业硕士学位。

西北工业大学研究生院院长朱继宏介绍，学校“博士+硕士”双学位项目主要面向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兵器科学与技术、材料科学与工程等优势学科的在读博士生开展二次选拔，符合条件的学生可以申请攻读人工智能的专业硕士学位。双学位项目是打破学科壁垒、超常规探索总师型高层次复合专门人才的自主培养新路径。

北京理工大学作为试点高校之一，通过“博士主导、AI赋能”模式，全面推进“AI+专业”战略，重点鼓励博士生修读人工智能硕士学位，推动人才培养从“学科中心”向“问题导向”、从“单一专业”向“跨学科复合”的转变。

读了博士再读硕士，反映出我国人才培养趋势变化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性机遇，2023年以来，教育部推动部分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试点建设学科交叉中心，积极开展高层次复合人才培养探索。

山东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韩勃介绍，“博士+硕士”双学位试点就成为探索超常规、高质量人才培养路径的必然选择。博士在科研过程中，需要通过交叉学科和跨学科的知识，解决一些“卡脖子”难题和前沿的科学问题。

读了博士，再读硕士，这并不是简单的学位叠加，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蓝文婷表示，“博士+硕士”双学位试点探索，是我国人才培养从学科中心转向问题导向的趋势，更加适配国家战略和产业升级的需求。

蓝文婷介绍，试点学校可以探索建立以解决复杂实际问题的能力为核心的评价标准，学生的毕业成果需直接对接国家重大需求与产业关键挑战，成果形式可以是关键技术突破、重要专利、行业标准或者产生时效的解决方案，以此引导学校、导师与学生共同聚焦科研成果的实际应用与转化价值，培养出能够服务国家战略、解决真问题的高层次、复合型创新人才。

（本文摘自央视新闻微信公众号，2026年4月9日）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五维联动 以学科建设推动学校高质量发展

学科建设是现代大学发展的核心引擎与根本基石。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始终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作为江西省“红色基因传承示范校”，深化红色文化研究，深入开展井冈山精神以及建军精神、方志敏精神研究，并将研究优势转化为育人成效。将红色文化融入学科团队建设与人才培养各环节，以服务谋发展，以贡献求支持，形成“战略引领—系统重构—精准发力—交叉融合—聚力攻坚”五维联动的学科发展模式，提升学科整体实力与社会贡献度，带动各项事业协同共进，形成以高水平学科建设推动学校整体办学水平跃升的崭新局面。

战略引领，顶层设计与育人实践深度融合 提升学科育人效能

学校坚持“以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需求为导向”，紧密对接国家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与江西省发展蓝图，以前瞻布局引领学科建设方向，并将其成果深度转化为立德树人的核心动能。

学科建设取得了系列标志性成果。学校连续入选江西省“十三五”“十四五”新增博士学位授予单位重点建设高校。现拥有一级学科硕士点16个、专业学位硕士点19个，硕士层次人才培养体系日臻完善。化学学科稳居ESI全球排名前5%，材料科学学科进入ESI全球前1%。教育学、化学两个学科入选江西省“十四五”一流潜力发展学科，蓄势待发。学校依托全国红色文化课程思政教学研究示范中心（筹）、全国红色文化育人共同体江西秘书处，并作为第一届江西省学校国防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单位，江西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指导委员会“红色文化”分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单位，扎实推进红色文化育人；学校获批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硕士点，擦亮学科发展红色底色。

学科建设助力立德树人取得新成效。学校紧密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将学科建设作为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核心引擎，构建了以学科发展驱动学生全面成长的有效机制。近年来，学校探索建立“数字化赋能产教融合学用一体的‘五进阶’式师资培养培训体系”；构建了“三融合”的“双创”教育体系，形成“课创—赛创—产创”全链条创新创业育人生态，人才培养效果显著提升。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牵头组建“天工”江西职教出海联合体，构建了政校企协四方联动、协同发力的出海发展新范式。

近5年，学生在各类学科竞赛中获国家级奖项500余项，连续10年在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中取得好成绩，共获8金26银49铜。2023年国赛获得2金5银6铜，金奖数连续两年位居全国师范类院校前列；2024年国赛获得2金2银7铜，国赛金奖总数位居全省高校前列；2025年国赛获得1金8银3铜，金银奖总数位居全省前列。在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中连续12年获一等奖，成绩位居全省高校前列。

系统重构，分层分类与集群发展协同并进 优化学科生态系统

为实现学科可持续发展，学校致力于打破学科壁垒，依据学科发展潜力、社会需求契合度及资源使用效益，进行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陆续出台《学院设置及学科专业结构优化调整实施意见》《学科分层建设实施方案》《学科群建设方案》《学科特区实施方案》等一系列纲领性文件，从制度层面系统推进“学院—学科—专业”一体化布局，确保改革纵深推进。

分层分类，优化学科发展规划。学校实施精准化战略，明确重点建设 3~4 个在国内具有显著优势和竞争力的“高峰学科”；培育 4~5 个特色鲜明的“高原学科”；扶持 10 个左右适应未来产业与社会需求的“潜力学科”，形成高峰引领、高原支撑、潜力厚植的可持续发展学科梯队。

优化布局，推动学科集群建设。学校强力推动学科集群建设，构建 6 大交叉融合学科群：人工智能与智能建造学科群、先进材料学科群、生物医药学科群、教育与产业学科群、党史党建与地方文化学科群以及博雅学科群。学科群构建紧密围绕国家战略急需、区域经济发展主战场以及前沿科技发展趋势，旨在打破传统学科格局，充分发挥学科交叉融合的“催化剂”作用，释放学科交叉融合活力。

精准发力，特色学科与重大需求深度融合 彰显学科服务价值

教育学科聚焦服务教育强国战略与江西省职业教育创新发展高地建设。作为江西省“十四五”一流学科，教育学科主编了全国第一本面向职业教育的工具书——《中国职业技术教育机构概览》，牵头研制了《新时代职业教育教师专业标准》等 7 项行业标准。近年来，荣获教育部高等学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江西省教学成果奖特等奖、江西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等省部级以上奖励 33 项，学科引领和服务职教发展的能力得到充分验证。

化学学科重点对接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国家战略与江西特色产业升级需求。作为 ESI 全球前 5% 学科和江西省一流学科，化学学科依托有机功能分子江西省重点实验室等 10 个省级科研平台，近 5 年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国家级课题 77 项，获江西省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等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 11 项，实现了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应用的贯通，有效服务了地方产业转型。

设计学科主动服务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与江西文化强省建设目标。依托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传承创新基地等 7 个省部级以上平台，荣获全国“十四五”规划教材、省级社科奖一等奖及教学成果奖等 20 项。设计学科团队先后主导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50、60、70 周年庆典江西彩车的设计工作；在冬奥会文化活动、海昏侯文创产品开发、滕王阁大空间 VR 沉浸式体验等数字文旅项目中发挥了核心作用，真正实现了“以美为媒，服务社会”。

交叉融合，机制创新与资源整合双管齐下 培育学科新增长点

统筹推进组织创新。学校积极整合智能制造学院、信息工程学院等相关优势学科与专业资源，组建了全新的人工智能学院，为打造具有竞争力的高水平人工智能学科群奠定了坚实基础。

学校整合校内文科科研平台、充分发掘文科教师科学研究潜力，组建江西科技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文史哲、经济管理、艺术学、法学等学科积极开展基础学科研究、交叉学科研究，提高学校文科的发展质量的同时，形成更加均衡、综合的学科体系，从而提升学校的整体学术竞争力。

积极开展跨学科攻关。学校围绕前沿领域和“卡脖子”技术问题，组建跨学科团队，开展协同研究。学校敏锐把握核医药产业发展趋势，在全国高校中率先创办核药“微专业”，并积极申报核药学本科专业，联合江西省肿瘤医院、原子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东诚药业集团

等核药领域企事业单位，共建“核药现代产业学院”，探索产教深度融合、学科交叉赋能的“新工科”人才培养模式。

聚力攻坚，人才高地与标志成果双重支撑 瞄准办学层次新突破

学校紧密围绕建设博士学位授予单位这一核心目标，通过集聚高端人才、加速科技创新，全面提升学科建设水平。

强化人才引育，激活学科发展引擎。学校将人才作为学科发展的第一资源，大力实施人才强校战略，成功引进和培育了多位国家级人才，江西省“双千计划”领军人才、井冈学者等省部级人才 200 余人次，6 名教师荣登全球前 2% 顶尖科学家榜单。高层次人才集聚效应日益显现，为学科攻坚提供了核心引擎。

突出创新引领，提升学科发展质量。学科发展质量与显示度持续提升。近 5 年，学校获省部级及以上科研奖 58 项，获江西省教学成果奖特等奖 3 项，体现了学科建设对教学改革的大力反哺作用。2025 年学校以通讯单位在《科学》（Science）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标志着学校在前沿基础研究领域已具备参与国际竞争的實力。

未来，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将继续深化和完善“多维联动”的学科发展模式，围绕“博士点突破、学科体系升级、交叉创新深化”等核心战略任务，以更高水平的学科建设，持续推动办学水平整体跃升，为服务国家战略、助推江西地方产业升级与教育创新注入强劲动力。

（本文摘自《光明日报》，2026 年 2 月 13 日第 10 版）

武汉工程大学：依托地方资源打造特色学科高峰

作为一所“化工”为鲜明底色，扎根荆楚大地办学的省属重点高校，武汉工程大学始终紧扣国家战略与区域发展需求，立足湖北磷矿资源禀赋，深耕磷资源全链条学科体系，走出了一条与“磷”为善、以“磷”为伴、产教融合、特色引领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成为推动湖北乃至全国磷化工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

锚定“磷”特色，构筑一流学科建设新高地

湖北磷矿资源丰富，磷化工产业基础雄厚。武汉工程大学自建校之初，便敏锐地把握这一地域和产业优势，将磷资源开发与利用作为学科建设的主攻方向，构建了从磷矿采选、磷化工工艺、磷基新材料到磷污染治理与资源化利用的全链条学科体系。

学校锚定“磷化工第一高校”目标，以湖北“71020”高校学科创新体系为指引，聚焦化学工程与技术一流学科建设，走好“专精特”之路，持续做强“磷”特色。一方面，坚持与“磷”为善，立足国家“双碳”战略与新能源产业发展需求，以磷资源全产业链创新为核心，做足“四个面向”的大文章。另一方面，坚持以“磷”为伴，以磷资源综合开发利用为主线构建跨学科生态，横向联动材料、环境、生物等学科，形成“磷+”交叉学科群；纵向贯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全链条，将资源配置、平台建设、项目申报、成果培育向“磷”聚焦，持续增强学科核心竞争力。

近年来，学校积极实施“一流学科建设突破行动”，学科实力显著提升。新增国家级人

才8人，以第一单位在Nature、Science子刊发表高水平论文2篇。获批一级学科博士点达4个，6个学科进入ESI全球前1%，化学学科进入全球前2%。在2025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中，学校进步幅度居湖北高校首位。

深化产教融合，培育高素质“磷化工”人才

学校将“磷”特色深度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着力培养“用得上、留得住、干得好”的行业专门人才。

学校积极引入数智化教学手段，推进现代化人才教育和培养。推进“零时差课堂”教学改革，实现教学响应零迟滞、教学场景零距离、教学过程零异步、教学协同零障碍，着力培养适应和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工程创新人才。开设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试点班，与行业龙头企业深入合作，将磷化工的最新工艺、案例融入课程，建设《磷化工工艺学》等一批特色教材。在2025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学校“基于大模型的智慧化工实验新范式”项目亮相湖北高教数字化成果展，广受关注。

学校与兴发集团、宜化集团等企业共建订单班，实现学生“入学即入职、毕业即上岗”的无缝衔接。学生深入企业生产一线进行认知实习、生产实习和毕业设计，在真实的工作环境中锤炼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此外，学校还积极鼓励教师“下沉”，深入工厂车间，担任企业“科技副总”或技术顾问，把论文写在生产线上，实现教学、科研与产业需求无缝对接。

强化人才引育，夯实创新发展根基

学校深刻认识到人才是强校之基、竞争之本，以省委“干部素质提升年”为抓手，将2025-2026年确定为“人才工作年”，大力实施人才强校战略，牢固树立涵盖人才引进、培养、使用和激励等全方位的“大人才观”。聚焦一流学科建设需求，实行校领导包干制和“四个一”专班引才机制，精准引进海内外磷领域顶尖人才。实施国家级高层次人才“一人一策”精准支持计划，完善人才分层分级培养机制，全力打造一批在国内外具有影响力的“大师”级人才。

今年以来，学校已全职引进多位国家级人才，博士后队伍规模稳步扩大。同步优化职称评审与绩效分配体系，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努力营造潜心育人、专注创新的优良生态，为学校事业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

攻坚“磷石膏”难题，守护长江生态安全

面对湖北磷石膏存量巨大、环境风险突出的现实挑战，学校主动担当作为，牵头组建“产学研用金”跨学科、跨领域的攻关联合体，实施“磷石膏高值（质）利用及规模化消纳关键技术与应用”湖北重大攻关项目，为破解“化工围江”困局、守护长江生态安全提供坚实的科技支撑。

项目聚焦磷石膏安全利用前处理规范化、消纳能力规模化、消纳前景高值（质）化三大目标，构建完全公开、可供复制推广的磷石膏高值（质）利用及规模化消纳的应用技术体系及场景示范，相关技术已成年消纳磷石膏百万吨级的能力。同时，学校还参编湖北省磷石膏地方规程，研发的“磷石膏无害化处理关键技术”被列入《国家工业资源综合利用先进适

用工艺技术设备目录》；编撰国内首套《磷资源开发利用》丛书。磷化工相关成果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省技术发明一等奖、省科技进步一等奖等荣誉，促进了磷化工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和经济社会的全面绿色转型，正助力湖北打造磷石膏综合治理的“湖北样板”。

深化产学研融合，赋能“磷”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

学校坚持“立足湖北，辐射全国，服务区域经济和化工行业”的服务面向，深度融入湖北“51020”产业集群和“61020”全链条攻关体系，积极探索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新机制，全力打通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最后一公里”。

学校大力实施科技强校战略，积极构建科研平台“金字塔”体系，建设磷矿及其共伴生资源绿色高效利用全国重点实验室、国家磷资源开发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高能级科研平台，聚焦磷矿浮选药剂、湿法磷酸净化、新型磷系阻燃剂、新能源磷基材料、磷石膏综合治理等方向开展科学研究。与兴发集团、宜化集团等省内磷化工龙头企业共建了多个产业技术研究院和联合实验室，以平台构建校企之间的“连接器”，推动校企协同创新。牵头组建“湖北磷产业绿色发展科技创新联盟”，承担了湖北大部分化工产业园发展规划。与中国五环工程有限公司共建磷石膏高值利用创新联合体，共同攻克多项关键技术，双方共建的孵化中心已进入中试阶段，正加速推动甲基丙烯腈、磷氟精细化学品等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

近年来，学校共牵头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 52 项，先后获国家、省部级科研成果奖 309 项，其中国家科学技术奖 7 项。攻克了磷矿选矿、超高纯芯片用电子级磷酸制备等“卡脖子”技术，为国家延长磷矿资源服务年限超过 60 年，连续 2 年入围中国科技成果转化百强高校。

面向未来，武汉工程大学将继续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紧抓“十五五”规划的关键节点，持续聚焦“磷”特色，做强化工底色，以更高的站位、更宽的视野、更实的举措，在服务国家“双碳”战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助力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的生动实践中展现更大担当、实现更大作为。（本文摘自湖北日报客户端，2025 年 12 月 16 日）

四川轻化工大学：学科特区模式攻坚博士点

近年来，四川轻化工大学瞄准国家战略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持续深化改革，创新发展理念，以轻工与食品、化工与材料、控制与智能装备三大优势特色学科群为引领，以现有学位授权点为支撑，形成多层次学科建设梯队，构建起结构合理、递进发展的学科高峰、学科高原和学科高地体系。

2022 年，四川轻化工大学化学（Chemistry）和工程学（Engineering）两个学科相继进入 ESI 全球排名前 1% 行列，这是该校加强一流学科暨博士点建设、推动学科建设内涵发展的突破性进展，也是多年来高度重视学科建设取得的重大成果。

精准施策，奋力推进博士点建设

在学校“十四五”发展规划的科学指引下，四川轻化工大学坚持以一流学科建设为抓手，

以博士学位授权点建设为着力点，持续推进博士学位授权点达标建设工程。

学校对标《学位授权审核申请基本条件》，加大对食品科学与工程、化学工程与技术、控制科学与工程三个博士学位授权点优先培育学科的建设力度，谋划新思路，采取新举措。建立“3+3”学科特区（3个冲击省一流学科+3个博士学位授权点优先培育学科），在政策支持、队伍建设、资金保障、人才引育、职称评审、各类指标投放等方面给予倾斜，开辟人、财、物绿色通道，并充分赋予先行先试权，鼓励创新发展，举全校之力打造学科高峰，引领特色高水平大学建设。

科学谋划，全面统筹优化学科布局

四川轻化工大学坚持“强化优势、突出特色、注重基础、探索前沿、协调发展”的学科建设方针，以工学、理学、人文社会学科、新兴交叉学科四类学科统筹布局建设，按重点、分层次地构建学科建设梯队，形成递进发展的学科高峰、学科高原和学科高地体系。

根据中长期规划，学校优先发展食品科学与工程、化学工程与技术、控制科学与工程等优势工学学科，引领学校学科建设整体发展；大力加强数学、化学、物理学等理学学科建设，以支撑其他学科的可持续发展；着力提高管理科学与工程、教育、法律、艺术等人文社会学科的实力和水平，振兴人文社会学科群的发展；培育建设纳米科学与工程、智能科学与技术、设计学、区域国别学等新兴交叉学科，抢占学科发展战略制高点。

此外，以轻工与食品学科群、化工与材料学科群、控制与智能装备学科群、管理与经济学科群、人文与艺术学科群为基础，四川轻化工大学深入实施学科建设加速提质行动，形成“布局合理、高峰凸显、高原崛起、梯次建设”的学科专业布局，积淀出鲜明的办学特色与学科优势。

加大投入，助力学科建设更上台阶

为加快推进博士点建设，四川轻化工大学充分发挥经费投入对学科建设的支撑作用，近年来着力改革财经制度，加强财经预算与规划实施的衔接协调，保障规划落实落地。

发挥学科建设的龙头作用，四川轻化工大学积极探索以学科建设为核心的经费预算机制，将人才引进、设备配置、科学研究、平台建设等方面的投入统筹到学科建设上来，以学科建设需要配置经费投入。同时，围绕一流学科、博士点、硕士点建设目标任务，建立分层次分类别的绩效考核体系，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确保学科建设成效。

据介绍，四川轻化工大学通过聚焦关键、错位竞争、特色发展，逐步形成独具特色的五大学科群和军民融合的发展之路。未来，将紧紧围绕学校中长期规划，锚定博士点建设，不断增强办学实力，深入推进学科建设，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本文摘自新华网，2023年6月1日）

宁波大学：扎根区域 学科登峰与博士点扩容双突破

第四次党代会以来，宁波大学始终牢记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紧扣“双一流”建设与省高水平大学建设战略机遇，把学科建设作为推动高质量内涵式发展的核心支

点，既“顶天”对接海洋强国、制造强国、乡村振兴、健康中国等国家战略，又“立地”深度耦合浙江“415X”先进制造业集群、宁波“361”万亿级产业集群，走出了一条地方高校“经世致用、扎根区域、自立自强”的特色办学路，学科实力与综合影响力持续跃升，成为支撑区域发展的核心创新力量。

强化顶层设计，构建“1237”学科体系新格局

学校坚持“扶强、扶需、扶特”原则，以“双轮驱动、学科登峰”为主线，构建“国家一省一市”三级学科协同体系，聚焦海洋工程与海洋环境、新材料与先进制造业、生物科学与工程、海洋经济与文化、生命与健康、大数据与人工智能、人文素质与艺术修养等七重点领域，打造“高峰引领、高原支撑、梯次发展”的学科生态。

学校新增体育学、中国史、物理学等7个一级学科博士点和1个教育专业学位博士点，博士点总数从6个增至14个，实现文科和专业学位博士点“双突破”；博士后流动站从3个扩至9个。学科布局更趋优化，学校现有32个一级学科和31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覆盖12个学科门类，学科专业结构上呈现理工农医类和人文社科类、学术型和专业型“双均衡”趋势；力学入选第二轮国家一流建设学科，水产入选省登峰学科，3个学科入选省一流A类学科。学科综合实力不断提升，在第五轮学科评估中实现整体进位，软科“中国最好学科”排名中水产学科连续6年全国前三；工程学跻身ESI全球前1%，ESI前1%学科从6个增至15个；21个学科进入“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食品科学与工程等3个学科跻身全球前50。

深化改革创新，完善现代化学科治理体系

学校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以一流学科带动整体发展，完善学院与学科互动、学科引领平台、绩效导向评价等运行机制，全力推进学科高水平、有特色发展。近年来，学校把体制机制改革作为学科建设的“关键一招”，破除制约学科发展的堵点卡点，充分激发办学活力。

学校持续压实责任链条，设置学科建设专职部门，组建由校主要领导牵头的力学、水产学科建设专项小组；出台《<宁波大学学科体系建设与管理办法>补充规定》，明确二级学院院长分管学科建设工作；修订学位点负责人聘任办法，推进一级学科与学位点一体化建设。持续优化资源配置，联合第三方机构形成多份学科建设分析报告，召开全校学科建设大会凝聚共识，修订学科建设经费管理办法，向“双一流”学科、优势特色学科、基础学科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倾斜；实施重点任务“项目化”管理，建立“需求导向、目标牵引、绩效挂钩”的经费配置机制。加强结构动态调整。出台学科专业优化调整方案，2023年以来自主设置涉外法治、低空技术与工程等22个急需二级学科和交叉学科，撤销12个适配度不高的学科，人才培养与区域需求的匹配度持续提升。强化过程管理，集成“双一流”监测、学科评估、学位点申报等多维指标，实施关键目标绩效考核机制，建立建设成效年度报告制度，形成“规划—配置—评价—调整”的全闭环管理体系。

聚焦“双一流”攻坚，力学学科跑出奋进加速度

力学学科锚定制造强国、海洋强国战略需求，深度融入区域发展，形成“基础厚实、应

用尖特、产研贯通”的鲜明特色，各项攻坚任务实行“挂图作战”，建设成效显著。

党建引领实现全国党建“双创”项目大满贯，“有专业味道”的大思政课被人民日报、央视等中央主流媒体报道，入选多项国家级思政精品项目；人才培养创新成果获浙江省教学成果特等奖，本科生深造率突破 50%，学子在“挑战杯”等国家级赛事中屡创佳绩；建成院士领衔、国家级人才为中坚的高水平师资队伍，近五年新引育师资 59 人，45 岁以下教师占比 68%；科研创新能力大幅跃升，近五年主持各类项目近 500 项、到账经费 4.1 亿元，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76 项、重大重点项目 36 项；成果转化精准对接产业，合作企业超百家，签约经费近 8 亿元，支撑宁波获批 37 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相关技术应用于港珠澳大桥、国防工程等国家重大工程；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建有 2 个国家 111 学科创新引智基地、2 个国际联合实验室，主办国际期刊、承办国际会议 15 次。

深耕“登峰学科”，水产学科实现创新与振兴同频

水产学科聚焦“两鱼两蟹一贝”特色方向，连续多年位列软科中国最好学科全国前三，在服务海洋强国战略与乡村振兴中交出亮眼答卷。

党建引领实现全国党建“双创”项目学院、支部、党员全覆盖，“塘边党课”等特色活动被人民日报、科技日报等中央主流媒体专题报道；构建四类人才培养模式，本科生深造率超 50%，获国家教学成果奖二等奖，建有水产养殖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形成“领军+青年”人才梯队，国家级、省部级人才达 40 人次，70%以上教师为产业服务型，80 余名科技特派员；科研攻关破解产业“卡脖子”难题，实现虎斑乌贼全人工繁育、银鲳规模化繁育突破，首创深远海养殖野生驯化技术，让 400 吨野化大黄鱼走上百姓餐桌；盐碱地海鲜养殖技术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减贫最佳案例，“海鲜陆养”技术助农增收近 20 亿元，病原芯片检测技术转化经费超 2400 万元，相关经验作为教育部精准帮扶典型案例全国推广。

对接战略急需，多维布局培育新增长点

学校主动顺应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趋势，推动学科布局向战略需求侧聚焦。

“医学高峰”加速崛起，2023 年成立医学部以来，获批临床医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新增医学技术专业学位硕士点，增设 7 个临床医学专业领域，直属附属医院从 3 家增至 6 家，医学人才培养与医疗服务能力同步提升。基础学科筑基提质，出台《关于加强基础学科建设的若干意见》，实施基础学科提升计划。物理学、生物学、中国史学科获批博士学位授权点，植物与动物学、化学、材料科学进入 ESI 全球前 2%，物理学、地球科学进入 ESI 全球前 1%，原始创新能力持续增强。交叉学科融合赋能，研究制定跨学科协同建设意见，布局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博士点、数字经济专业硕士点，自主设置低空技术与工程、同一健康科学与工程等交叉二级学科，实施“力学+”战略与水产学科共建共享计划，推动学科间优势互补、协同创新。

近年来，在学校党委引领下，以产业思维抓学科建设的理念愈加深入人心，强调从学科自我发展“小逻辑”向服务社会“大逻辑”转变，打造了“一体两翼多触角”成果转化体系，建成宁波大学科技园、创新港、概念验证中心，组建专业化技术转移公司，发起总规模 3 亿元的宁波大学创新港基金，专利转让数量位居全国高校第 32 位；跨海大桥防船撞技术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内陆盐碱地海鲜养殖技术惠及新疆等多地，乡村振兴“大学小镇”模式在全省推广，真正实现了学科建设与区域发展同频共振、与国家战略同向而行。

面向未来，宁波大学将沿着第五次党代会确定的方向，以锐意进取的姿态深化改革、凝练特色，在服务国家战略、支撑区域发展中勇担使命，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更多“宁大力量”。

（本文摘自宁波大学官网，2026年5月20日）

博士点授权体制改革与地方高水平大学发展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以下简称《纲要》）中明确提出，要全面构建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在全面构建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过程中，地方高水平大学的发展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其理由在于，在既往的注意力配置机制和政策着力点方面，我国一直将少数大学作为重点建设对象，并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但是，在教育强国建设的现实语境下，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不仅有赖于少数头部高校（也可称之为“第一方阵”高校或精英高校）发挥引领作用，而且有赖于数量更为庞大的地方高水平大学（也可称之为“第二方阵”高校）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

关于地方高水平大学发展及面临的问题，既往文献已展开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探讨。与既往研究的切入视角不同，本研究将在分析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与地方高水平大学建设关系的基础上，重点探讨博士生教育的功能及其对地方高水平大学发展的重要意义，并提出以博士学位授权机制改革促进地方高水平大学发展的改革思路和政策建议。

一、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建设与地方高水平大学发展

（一）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对高等教育强国的极端重要意义

高等教育体系主要用来描述一个国家所有的高等教育组织。当前我国的高等教育正处在由大到强的发展转变过程当中，高等教育强国建设已成为重要的国家意志和政策热词。在此背景下，有必要重新反思和强调高等教育体系对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极端重要意义。

全面构建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是《纲要》中的政策性话语，也可以将其表述为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体系建设。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是教育强国的奠基工程，也是未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的战略任务。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不仅要求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更要建成一个完整、强大而且协调的高等教育体系。有研究指出，高等教育体系涉及规模、结构、质量、效益、公平五个基本变量，高等教育健康发展是五个基本变量内在协调统一的发展。在传统的高等教育“重点建设”思维过程中所形成的，是一个更加呈现出等级化、封闭化、静态化等综合特征的高等教育体系。因此，有必要从体系建设的整体视角切入来反思如何构造高质量的、卓越的、良性的高等教育体系，将既往的“重点建设”思维升级为“整体建设”思维，从而为高等教育强国建设奠定制度基石。

（二）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的典型特征

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至少需要具备如下特征：一是开放性；二是多样性；三是互动性；四是活力性。

（三）地方高水平大学作为新的增长引擎

目前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少数重点建设的精英大学已经取得了显著的发展成就。但是，高等教育强国建设作为一项整体推进的国家战略，仅仅依靠少数头部高校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必须从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构建的角度，打造数量更庞大的“第二方阵”或“第二梯队”高校。在国家深入推进新一轮“双一流”建设的政策背景下，将地方高水平大学建设作为盘活高等教育体系活力的新的增长引擎正当其时。在地方高水平大学的内涵界定方面，有研究指出：从办学定位上看，这部分高校主要立足地方，面向全国，力争办成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大学；从办学体制上看，这部分高校的管理和隶属关系主要归地方所有；从办学水平上看，这部分高校普遍位于省属高校办学的前列。换言之，地方高水平大学建设主要关注在中央直属系统高校之外隶属于地方并形成鲜明办学特色和很高办学水平的大学群的建设和发展问题。作为新的增长引擎，地方高水平大学的建设和发展对于优化整体的高等教育体系和结构，促进高校特色化和差异化发展，整体提升国家和地方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和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

二、博士生教育的“下位功能”与地方高水平大学发展

（一）博士生教育的新功能定位

博士生教育是学历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学位授权级别直接反映高校的层次水平、质量等级与发展潜力。在传统的功能定位中，博士生教育通常强调的是对高层次人才培养、高层次人才与科技结合以及对国家创新能力的贡献等功能，可以将这种功能定位称之为博士生教育的“上位功能”。“上位功能”定位强调研究生教育是国家人才竞争和科技竞争的重要支柱，是培养高层次人才的主要途径，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核心要素。与此同时也可以看到，在现实语境中，能否获取博士学位授权资格，能否进入博士生培养行列以及能否实施博士生教育，对大学自身发展以及大学所在区域的发展亦具有重要的影响。地方政府和地方高水平大学对于进入博士生培养行列，开展博士生教育的需求是一种更为迫切和强烈的提升办学层次和办学水平的现实且理性的需求。相应地，可以将这种主要面向大学和区域需求为重心的功能定位称之为博士生教育的“下位功能”，这种功能定位强调博士生教育是大学办学水平提升的主要标志，也是支撑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博士生教育的新功能定位对于破解地方高水平大学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瓶颈，对于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构建，对于深度促进高等教育与区域和产业的互动发展，均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二）地方高水平大学发展面临的瓶颈

地方高水平大学发展中面临的瓶颈主要包括：一是学科发展瓶颈；二是师资队伍约束；三是生源质量欠佳；四是学术交流困境。

其一，学科发展瓶颈。学科（或称之为学位授权点）不仅是一种知识形态，而且是一种组织形态，更是研究生培养的直接载体和依托。在研究生教育规模持续扩张的现实背景下，硕士生教育资源和教育机会获得了很大程度的释放。对于地方高水平大学而言，其面临学科发展瓶颈，主要指的是优势学科能否进入博士学位授权行列，能否获得博士生培养资格。由

于缺乏更为精细的统计数据,此处以能公开获取的全国层面的统计数据为例,对博士学位授权点及授权审核情况进行简要分析,以呈现博士生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和地方高水平大学学科发展面临的瓶颈。

从最新的学术学位授权点的省域分布情况来看,2022年博士/硕士一级学科授权点相比的系数显示:北京(1.23)和上海(1.13)均超过1,为全国最高;广东(0.98)、福建(0.95)、江苏(0.74)、湖南(0.71)和陕西(0.66)五省的这一系数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浙江(0.62)、湖北(0.62)、山西(0.61)和重庆(0.60)的比例在0.6左右;这一比例在0.4以下的省份包括河北(0.37)、贵州(0.37)、河南(0.35)、广西(0.32)、江西(0.30)、宁夏(0.30)、青海(0.21)和西藏(0.13)。从最新的专业学位授权点的省域分布来看,2022年博士/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相比的系数显示:上海(0.11)和北京(0.10)为全国最高;天津(0.09)、湖北(0.08)、广东(0.07)、江苏(0.07)、重庆(0.07)、黑龙江(0.07)六个省市的比例也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福建、湖南、陕西、浙江、山西、四川六个省份的比例均为0.06;吉林、安徽、辽宁和山东四省为0.5;甘肃、云南、新疆、贵州、广西五省为0.4;河北、河南、江西、海南、宁夏、内蒙古、青海、西藏的这一比例均低于0.04。具体见图1所示(略)。上述数据反映出,博士生教育资源在省与省之间不均衡分布的问题较为凸显。

从博士学位授权点的校际分布情况来看,有学者采用学科规模指数(指数越大,代表博士点的数量越多)和学科平衡指数(指数越大,代表博士点的分布越平衡)进行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学科规模指数和学科平衡指数均高于一流学科建设高校,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在这两项指数上的均值也都要高于非“双一流”高校;综合性大学的学科规模指数均值和学科平衡指数均值均高于其他类型高校。艺术、体育、医药、语文、民族、政法、财经类院校的两项指数均值都较低。另外,地方高水平大学的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和数量偏少,培养规模总体偏小,发展后劲不足。

从博士生招生的省际分布情况来看,2022年学术学位博士生招生总数为11.44万人,其中,北京招生占比最高,为26.55%,其次为上海(9.32%),仅北京、上海、江苏、湖北和广东五省的博士生招生占比之和就达到54.92%,而河北(0.95%)、江西(0.80%)、河南(0.98%)、广西(0.69%)、海南(0.36%)、贵州(0.46%)、云南(0.99%)、青海(0.17%)、宁夏(0.21%)、新疆(0.64%)和西藏(0.09%)的占比均低于1%。2022年专业学位博士生招生总数为2.46万人,其中,北京招生占比最高,为17.25%,其次为上海(8.38%),山西(0.69%)、内蒙古(0.00%)、广西(0.83%)、海南(0.16%)、贵州(0.71%)、西藏(0.00%)、青海(0.00%)、宁夏(0.20%)和新疆(0.81%)的占比均低于1%。上述数据表明,较多省份的地方高水平大学建设过程中面临的无法实施博士生教育的瓶颈约束问题非常突出。

其二,师资队伍约束。有研究指出,地方高水平大学普遍存在人才缺失问题,特别是在“双一流”建设实施以后,高校之间的人才竞争更加激烈,导致地方高水平大学的引才留才育才工作陷入更大困境。此外,地方高水平大学中师资队伍存在的结构性困境问题较为明显,现有师资队伍博士率低且难以优化,学术梯队的年龄结构、学历结构、职称结构和学缘结构

失衡,青年学者晋升渠道不畅等问题较为突出。师资队伍建设的载体是学科平台,特别是博士学位授权点。如果缺乏学科平台,大学在师资队伍建设中面临的困难、压力和挑战是显而易见的。实际上,地方高水平大学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师资队伍约束,也是这些高校在学科发展瓶颈上的外部显现。高水平的学科建设离不开高素质的人才队伍,缺乏学科平台依托则很难建立起来人才队伍的长远发展机制,最终会影响师资队伍的职业黏性和忠诚度。

其三,生源质量欠佳。学位点是研究生培养的直接载体。近十多年来,硕士生的规模扩张主要由地方高校来吸纳,但学位点若缺乏博士生培养资格,地方高校就无法留住本校的优秀硕士生源,也无法吸引外校的优秀生源。其结果是,缺乏博士授权的学科点只能是“单向输出”生源而无法“输入”。另外,本科生在报考研究生时,多会将培养单位是否具有博士生培养资格作为重要的备选条件,这会进一步影响未获得博士授权资格学科点的生源质量。现行高等教育结构的单一化和封闭化倾向,使得高校和学生只能被动地沿着学术阶梯单向通道不断朝上奋进,以此争取到更多资源和更有利位次,却因而失去了多样化选择、特色化和个性化发展的机会。有研究指出,我国31个省份研究生与本科生规模内部发展不平衡,各个省份之间、八大区域之间研究生与本科生规模协调度不高。这种不平衡和不协调也是很多地方大学生源结构单一,生源质量欠佳的突出表现。

其四,学术交流困境。学术交流与合作最为重要的体现是人员的交流,相较于短期的、临时的访学、会议等形式交流,教师互聘和生源互招是最为重要且能够产生长远积极影响和效果的主要方式,而教师互聘和生源互招依赖的平台依然是学科点,特别是博士授权学科点。实际上,地方高水平大学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师资队伍约束、生源质量欠佳和学术交流困境等问题皆是学科发展瓶颈,特别是无法进入博士学位授权行列所引致的。换言之,能够进入博士学位授权行列,能够获得博士生培养资格,地方高水平大学就能够极大增强自身的“造血功能”,面临的这些发展瓶颈也能够逐步迎刃而解。

(三) 博士学位授权对地方高水平大学发展的牵引作用

由于我国实施的是国家学位制度,合法设立的高校并不当然具有颁发学位的权力。高校必须通过学位授权申请审核并获得通过后,方可在获批通过后的学科点中进行人才培养活动。有研究通过对我国一流大学建设高校过去40年新增博士点的来源进行统计指出,政府政策和政府管控是影响我国高校学科设置的主导因素,大部分高校当前的学科布局与最初的学科布局仍然非常相似,高校学科布局发生实质性改变的情况还很少见。博士生教育的“下位功能”表明,获得博士学位授权,不仅有助于地方高水平大学突破自身发展瓶颈实现办学水平的跃升,而且能够提升地方政府在促进地方高水平大学发展中的积极性和参与度,进而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及科技的发展进步。由于博士生就业具有较强的“属地就业”特征,地方高水平大学发展博士点可以有效缓解区域经济社会用人紧张的尴尬局面。总之,博士学位授权对地方高水平大学的发展和地区综合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牵引作用,同时,更多的地方高水平大学进入博士学位授权行列,也能够进一步优化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结构和体系,进一步增强区域和大学之间的竞争和活力。

三、以博士学位授权机制改革促进地方高水平大学发展

（一）由“单轨授权”转向“双轨授权”

我国实行的是国家学位制度，在研究生教育的相关改革中，学位授权审核机制的改革一直起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核心作用，提升研究生教育质量和竞争力也应首先从学位授权审核机制改革中寻求突破口和着力点。统计结果显示，2024年全国博士学位授权点申请审核的拟获批率较低，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的拟获批率（47.44%）和博士学术学位授权点的拟获批率（42.41%）要远低于同年度硕士专业学位（89.66%）和硕士学术学位的拟获批率（90.24%）。

回顾新中国的学位授权申请审核历程可知，最初的申请和授权是在二级学科层面进行，之后逐渐试点在一级学科层面申请和授权，2017年出台的《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办法》中明确规定，学位点申请面向一级学科和专业学位类别，博士层面二级学科授权的通道基本被关闭。关闭二级学科申请审核的通道对地方高校产生的不利影响值得展开分析。首先，从学科知识属性来看，二级学科是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的真正场域，集聚的是“小同行”，而一级学科往往具有虚拟的意义，学科优势和特色的形成更多体现在二级学科层面。其次，从学科组织属性和学科建设角度来看，高校学科建设的资源具有稀缺性，不太容易在一级学科层面同时铺开，更为现实的路径是优先建设和发展具有特色和比较优势的二级学科，在二级学科层面的资源投放更具效率，也更容易打造学科高峰。一级学科授权审核机制会极大抬高授权的门槛，这对于很多谋求特色型发展的地方高水平大学的学科建设积极性会产生极大的抑制作用。再次，从学科优化、调整和培养的角度来看，大学和地方政府在二级学科层面更容易实施授权培育机制，也更容易对学科进行动态调整和优化。学位授权关闭二级学科通道，导致原来一些需求旺盛且“相对稳定、成熟的二级学科”遭遇生存危机和困境，一些优势突出、特色鲜明的二级学科在一级学科的框架下被“抹平”，面临资源稀释的危机甚至被撤并的结局。重点学科建设不再以二级学科为单位，会使拥有很强实力和鲜明特色二级学科的高校陷入是“做大做强”一级学科还是继续保持二级学科优势和特色的选择困境中。总之，国家层面有必要重视学科授权机制和评估机制对二级学科发展造成的机制型“瓶颈约束”，并充分尊重二级学科的地位和作用。

在学位授权审核机制改革时，一种可行且便捷的调整思路是，可考虑将现行的“单轨制”授权模式调整为“双轨制”授权模式，即在以一级学科授权为主的同时，不关闭二级学科授权的通道，而是将两种授权通道同时开放。“双轨制”学位授权审核模式下，不仅更加有利于调动各个层面（省域、高校、学科点、导师等）的办学积极性，而且有利于在管理重心和质量保障重心下移的前提下落实培养单位的办学自主权，进而打造一批更有特色的学科点及学科研究方向，建设一批高水平、有特色的地方大学和优势特色学科。这对于均衡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差距，促进我国研究生教育生态化发展，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研究生教育质量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可以设想，随着二级学科授权“政策约束”的消失，更多地方高水平大学的优势和特色的二级学科有望进入博士学位授权行列，这对于提升地方高水平大学的水平和竞争力将产生极大促进作用。由此，我国研究生教育的整体竞争性将进一步增强，这也有助于将研究生教育领域的重点突进战略转变为整体推进战略，从而带动研究生教育整体实力不断

向新的台阶攀升。

（二）由“单一标准”转向“复合标准”

对于专业学位而言,可继续探索在博士层次设置更丰富的专业学位类别,以更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迫切需求。2022 年全国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类别分布情况为:教育(31个)、电子信息(54个)、机械(43个)、材料与化工(41个)、资源与环境(37个)、能源动力(35个)、土木水利(27个)、生物与医药(31个)、交通运输(18个)、兽医(17个)、临床医学(50个)、口腔医学(26个)、中医(24个)。由此可知,目前的博士专业学位主要集中在工程、医学和教育领域,特别在人文社科领域的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数量较少且类别不够丰富,尚不能完全满足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对人文社科领域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的迫切需求。在国家大力发展博士专业学位教育的新时代背景下,自然科学领域和人文社科领域博士专业学位类别(领域)如何进一步丰富设置,审核申请的基本条件、培养规格要求及条件质量保障值得进一步开展研究和试点工作。

实际上,与学术学位研究生培养不同,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主要面向实践和应用,关涉实践性知识生产和转化,与行业和产业紧密关联,这类学位的授权审核条件和要求更为复杂,研究生培养面临的挑战也更大。有研究指出,我国专业学位博士教育存在培养目标定位不清,导师制度流于形式,学生的能力提升与发展需求不匹配,对博士专业学位认知不清等突出问题[28]。对于博士专业学位的授权审核,应注重由重点考察培养单位的学术资质“单一标准”转向既注重学术资质同时重点评估知识转化和应用的“复合标准”。2024 年最新出台的《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申请基本条件》,对博士专业学位类别(领域)申请基本条件中有关“知识转化”和实践性知识标准和要求的相关规定和要求较为模糊,可进一步清晰化标准和要求。如教育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申请基本条件中实践教学的要求为“具有与行业长期合作的有效机制。有满足开展案例教学需要的空间和条件。行业兼职教师与兼职导师能有效参与培养工作。相关院系专任教师有公开出版的教育专业案例教材。”社会工作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申请基本条件中实践教学的要求为“有专职的实习督导老师和实践教学团队。保证社会工作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能够参与专业应用背景明确、面向国家或地方社会工作发展重大需求的实践研究课题或专业实践项目。实习培养环节实行‘双导师’制。有案例库建设的基础、有规范的案例教学制度,每学期均聘请行业资深教师授课。”

（三）博士学位授权机制改革对地方高水平大学发展的意义

首先,通过博士学位授权机制改革打造高等教育发展的“第二方阵”。在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顶尖梯队之外,亟需形成一批综合实力较强、服务国家和区域发展能力突出的高水平大学群体,构建高等教育发展的“第二方阵”。这一方阵并非顶尖高校的简单替代,而是承担着补充、支撑与引领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博士学位授权不仅是高校发展层次的标志,更是推动地方高水平大学形成“第二方阵”的关键制度工具。通过机制改革与政策引导,可以让这批高校在国家高等教育格局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既支撑顶尖阵营的发展,又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与科研保障。“第二方阵”有助于弥补高等教育结构的“中部空缺”并提升整体竞争力,有助于在区域协调发展、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型创新等

方面承担主力军作用，也有助于为一流阵营提供“储备军”和学科梯队支撑。

其次，通过博士学位授权机制改革促进地方高水平大学特色化和多样化发展。博士学位授权机制改革对地方高水平大学而言，不仅是一个赋权过程，更是推动其学科优化升级、人才集聚、科研创新与服务能力提升的关键抓手。其本质意义在于帮助地方高校摆脱被动适应，转向主动引领地方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实现内涵式、高质量的发展。通过开放二级学科授权，地方高校可聚焦优势学科和领域，形成鲜明学科品牌，增强在特定领域的影响力和竞争力。二级学科授权机制能够促进地方大学更加聚焦学科的优势和特色领域以及区域和地方的发展需求，帮助地方高水平大学更加精准塑造自身学科特色，增强科研创新能力与人才培养水平，提升其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这种机制调整能够有效推动高校形成差异化竞争格局，促进学科的高质量发展，从而助力地方高校特色化建设迈上新的台阶，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更高层次的学科竞争力。

再次，通过博士学位授权机制改革提升地方政府在促进地方高水平大学发展中的积极性和参与度。有研究指出，全国各省份共投入近千亿元“双一流”建设配套资金支持省域高水平大学或特色学科发展，为地方高水平大学建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基础保障。通过加大财政投入和政策支持力度，地方政府能够根据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实际，有效改善高校科研条件和人才培养环境，精准支持博士学位授权点及特色学科建设，促进学科与地方产业的深度融合。授权机制改革还有助于推动政府与高校间的信息共享与协同治理，深化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形成促进地方高校高质量发展的合力。完善的授权机制有助于强化地方政府的责任意识，使其更加主动参与高校规划、资源配置及绩效评价，助力高校实现差异化特色和可持续发展。未来，应继续优化授权政策，强化地方政府激励与监督机制，推动多方协同、高效运行，构建地方高水平大学建设新格局，助力区域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实施。

最后，通过博士学位授权机制改革促进高等教育体系良性发展。博士学位授权机制改革通过优化学科布局、强化质量保障和推动特色化差异化发展，有助于促进高等教育体系的良性互动。该改革一方面能够引导地方高校依据国家战略和区域需求，合理设立博士授权点，提升学科结构科学性，避免资源浪费；另一方面，地方高水平大学的特色化差异化发展也有助于增强高校与地方政府及产业的协同，促进产教融合与科技转化。整体来看，博士学位授权机制改革可以有效推动我国高等教育的结构优化与质量提升，促进自强卓越、开放包容的高等教育体系形成，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和高质量教育体系奠定坚实基础。（本文摘自《中国高教研究》，2025年第10期）

新质生产力背景下高校学科专业优化调整：价值遵循、实践困境与推进路径

2024年2月，习近平在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提出，“要根据科技发展新趋势，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人才培养模式，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培养急需人才”。这一指示明确了高等教育在新时代的重要使命和任务，强调了高校应紧密

结合科技进步的动态,及时调整学科布局,使学科设置更加契合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求。同时,高校应注重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大力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精神和跨学科素养,以培养出能够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的各类专业人才。通过优化学科设置和人才培养模式,高校能够为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推动我国在新的历史时期实现更高水平的发展。

新质生产力是指以科技创新为核心要素,以知识、技术、信息等新要素为主要推动力的先进生产力形态。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人才是核心动力的源泉。高校作为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其学科专业的优化调整显得尤为重要。近年来,国家先后出台了《关于深化新时代高等教育学科专业体系改革的指导意见》《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等文件,给高校学科专业优化调整营造了有利的政策环境。各省市因地制宜,相继跟进出台了配套政策文件,如《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实施方案》《学科专业建设行动计划》等,以优化调整地区高校的学科专业。当前我国各地高校优化调整学科专业规模之大,范围之广,既是对过往的学科专业体系的一次迭代更新,也是为实现质变突破的系统性的实践尝试。因此,为更好地培育新质生产力,实现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亟须在新质生产力背景下探明高校学科专业优化调整的价值遵循,厘清其实践困境,进而探索更具针对性的推进路径。

一、新质生产力背景下高校学科专业优化调整的价值遵循

建成教育强国是“实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先导任务、坚实基础、战略支撑”。建设教育强国,龙头是高等教育。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地位与作用已从经济发展的“助推器”转化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发动机”,从规模扩张转向内涵发展。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背景下,高校学科专业优化调整亦遵循着双重价值逻辑,既要满足生产力发展对优质高等教育的需求,又需回应高等教育自身变革的内在发展要求。

(一)满足生产力发展对优质高等教育的需求

新质生产力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高校作为国家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的重要基地,承载着培养高素质人才、推动科学技术进步的双重使命。在这一过程中,高校不仅是教育生产资料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复杂的生产关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高校肩负着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任,这是时代赋予它们的使命,也是国家发展的需要。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高等教育的发展与经济社会的进步紧密相连。高校学科专业优化调整,就是要根据国家发展战略和市场需求,调整和优化学科结构,培养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的高素质人才。这种调整不仅是为了满足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更是为了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一方面,经济发展需要高校的科学研究更具创新效益。在21世纪这个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科学技术的突破不断催生着产业变革,并体现出了学科融合性特征。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打破了传统单一学科科学研究的界限,日益依赖交叉学科和跨学科的知识融合。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为例,这一技术的兴起将深刻改变各行各业的运作方式,为经济增长注入新的活力,同时也为社会的各个层面带来深远的变革。202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和化学奖都涉及了人工智能领域,可见其近年来所取得的突破性发展得益于诸多学科的助力

(包括基于生物学知识的人工神经网络构建, 基于物理学知识的机器深度学习, 等等), 同时也促进了众多学科的科研进步, 反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传统的高校科研大多基于单一学科, 学科与学科之间缺乏交流, 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是多维的, 其所遇到的技术掣肘需要学科融合才能得以有效解决。2020年, 国家决定设置“交叉学科”门类也体现了这一点, 可见当前经济发展需要跨学科融合以实现更高效益的科学研究。

另一方面, 经济发展需要高校的人才培养更具先进性。客观地说,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因此人才培养的结构也应当逐步转向, 以适应产业结构的变化。2023年4月, 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的《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中提出, 优化调整高校20%左右的学科专业, 新增一批适应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专业。人才供给结构要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 高校学科专业优化调整亦是人才供给结构优化调整的过程。事实上,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对高质量劳动力的要求在不断提升, 高校学科专业优化调整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方式。传统的专业设置及其相应的人才培养存在着一定的弊端, 例如专业设置的窄化导致人才培养的单一性, 专业选择的固化导致人才转型的困难, 课堂专业知识的滞后导致人才培养无法跟上现实需要, 等等, 这一系列专业问题阻碍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当前, 高质量劳动力的先进性特征更多地指向复合型、创新型人才, 高校学科专业优化调整需适应市场对人才需要的不断变化, 培养出更多符合新兴产业需求的高素质人才。

(二) 回应高等教育自身变革的内在发展要求

高校是社会知识的集聚中心, 在引领经济社会发展上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 高校作为“人才第一资源、科技第一生产力、创新第一动力的重要结合点”, 其作用的发挥相对有限。新质生产力的加速发展进一步催化了我国高等教育变革的内在发展要求, 高等教育亟须变革自身的发展方式, 从外延式发展逐步转向内涵式、高质量发展, 才能保证自身在当代社会中的先进性。

我国近代大学的产生与发展, 主要得益于对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先进经验的借鉴与吸收。我国高校的学科专业建设亦是如此。“学科”一词由英文“discipline”翻译而来, 其内涵主要有两种: 一是作为一种知识分类体系, 二是作为一种知识劳动组织。从知识发展与分化的角度来看, 学科的产生与发展事实上源于人们对自然界知识的不断探究, 并意识到知识与知识间的相关性与独特性, 进而衍生出系统性的知识。这种知识间的关联对传统的整体的混沌知识体系产生了冲击, 逐步分化出一门门独立且具有内在关联的学科知识体系, 例如数学、物理学、化学等。从劳动组织的角度来看, 由于学科作为一种知识分类体系产生和发展, 学科也逐步成为划分和组合学术活动的基本方式。正如伯顿·克拉克所言, “学科明显是一种联结化学家与化学家、心理学家与心理学家、历史学家与历史学家的专门化组织方式”, 即成为学术工作中的劳动分工。不论是作为知识分类或是作为劳动组织, 学科在西方的产生与发展深刻影响着我国高校的学科建设, 例如设置学科门类、根据学科设置院系等。从专业建设上看, 我国将专业作为学科下的一级建制加以固化的观念, 是学习苏联高等教育的产物。

近年来, 我国高校的学科专业建设所存在的弊端和问题正逐步显现。一方面, 固化的学

科院系设置和学术劳动分工严重阻碍了知识在不同学科和院系间的交流,进而难以形成更具创新性的知识突破。由此导致的后果是,我国高校的知识生产水平相较于世界一流大学的知识发展水平仍有较大差距,在当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背景下,其所需的跨学科与交叉学科科学研究更加难以推进。另一方面,窄化的专业人才培养限制了个体成长成才的空间。其后果表现为,高校毕业生无法直接参与到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缺乏与实际生产相适应的知识技能,而培养这部分知识技能的责任甚至转嫁至行业企业、第三方培训机构等组织,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上的质量、地位和作用等饱受社会质疑。在新质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背景下,个体单一性的知识技能更加难以适应其发展需要,拔尖创新型人才的缺失亦是此种培养模式导致的后果之一。不论是在促进个人发展还是在促进社会发展上,高等教育的地位和作用都存在下滑的危机。因此,我国高等教育系统本身就具有变革发展的要求,高校学科专业的优化调整需要让我国高等教育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

二、新质生产力背景下高校学科专业优化调整的实践困境

在新质生产力背景下,高等教育面临着重大的挑战与机遇。这一转型不仅要求高校适应快速发展的科技进步和社会需求变化,还需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实现学科专业的优化调整。然而,现实中高校在这一过程中遭遇了诸多困境,包括学科建设、专业调整、高校发展、资金投入等问题。这些制约了高校人才培养的质量与效率,亟须通过创新思维与实践探索找到解决之道,为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一)学科困境:庸俗功利化倾向与工具理性

高校的学科调整困境可以从学科建设与学科管理两方面审视。第一,在学科建设的过程中,我国高校的建设行为带有一定的庸俗功利化倾向。所谓庸俗功利化,主要指的是功利取向的异化,亦即将“功利”简化为物质利益并将其推崇到极致。它在高校学科建设的实践中表现为无视学科发展的实际效用或长远规划而专注于眼前利益,追求一种急功近利的“速成式”发展。这是由于,我国大部分高校尤其是公办高校办学经费的主要来源是政府拨款,而高校进行学科建设往往伴随着资源重新分配与政策倾斜。新质生产力作为最新的政策方向,亦引导着高校进行相应的学科建设。从学科建设的路径上看,我国高校常通过建设学院的方式进行学科建设。邬大光教授曾指出:“把学科建设与学院建设‘捆绑’在一起,是我国高校常见的学科建设路径,当我们需要对某个研究领域发力时,往往是成立一个与之相匹配的机构,以此彰显对该项工作的重视,并辅以相对丰富的资源配置。”但学院建设是否能真正转化为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关键还在于人员整合、资源利用、机制创新、管理革新等各类配套建设能否得以落实,而这正是我国高校学科建设过程中所忽视的部分。反观世界一流大学,极少成立新学院。斯坦福大学于2021年成立的杜尔可持续发展学院为该校70年来首次增设的学院,至此该校共有8个学院。耶鲁大学于2022年成立的杰克逊全球事务学院是该校继1976年创设管理学院以来成立的又一所专业学院,打破了近50年没有创设新学院的传统。在没有增设新学院的时段里,世界一流大学如何进行学科建设、紧跟经济发展新态势,或许是我国高校进行学科调整以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更加应当关注的内容。第二,在学科管理的过程中,我国高校体现出较强的工具理性特征。对学科的管理,尤其是学科评价的方式决定

了学科建设的发展方向，正如马陆亭教授所言：“有什么样的评价指挥棒，就有什么样的办学导向”。而现有评价方法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以同行评议为核心的定性评价模式和以科学计量为核心的量化评价模式。当前，我国高校学科管理的工具理性特征集中反映在量化评价泛滥的问题上，在现实中体现为：评价政出多门、类目庞杂，评价指标以易于识别的数量指标为主，评价标准多变且要求不断抬升，评价结果与奖惩机制高度挂钩，等等。因此，高校在进行学科建设的过程中易过度锚定评价目标，并将目标层层分解加码至校内的各院系、科研院所等，最终成为每位科研工作者肩负的考评目标。由此导致的后果是，学科建设仅是为了达成目标而忽视了学科发展本身的价值，“研究高深学问”“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等功用日渐式微。“只有为有价值的目标而竞争时所付出的努力和所表现出的主动性才是有益的，一旦动机不纯，大学之间的竞争就变得不那么有利了。”其实，学科调整不单是门类、内容的调整，变革学科管理方式以实现发展价值，也是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

(二)专业困境：不稳定性与悬浮性调整

我国高校在专业调整上主要面临不稳定性与悬浮性两大挑战。首先，专业调整的不稳定性显著体现在其滞后于经济发展的态势上，使得整个调整过程始终处于被动跟随的尴尬境地。国家从宏观层面出发，已经制定并适时调整专业目录，以此明确各高校可开设的专业范畴及其具体开设要求。然而，在新质生产力迅猛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国家专业目录的调整在紧跟经济发展步伐及满足地方实际需求方面，面临着不容忽视的滞后性风险。尽管我国专业目录的调整周期已从过去的十年一调缩短至如今的一年一调，但仍然难以精准捕捉并响应各地的具体发展需求。此外，专业调整的不稳定性还鲜明地反映在高校专业数量的剧烈波动上。通常，高校依据自身实际情况，在满足国家既定开设要求的前提下，积极申请开设相关专业。由于专业设置往往与资源配置紧密挂钩，因此高校普遍倾向于增设新专业，以期获取更多的资源支持。然而，这一趋势叠加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多变需求，极易引发专业的“大规模增设与撤销”现象。例如，2024年我国增设了1673个国家战略急需的专业布点，同时撤销了1670个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专业布点，撤销数量相较于2014年增长了近25倍。在社会发展不确定性日益增加的背景下，如此大规模的专业调整，无疑进一步加剧了人才供给与培养的不稳定性。

其次，在高校进行专业人才培养的具体实践中，专业调整的悬浮性特征表现得尤为突出。理论上而言，高校在启动某一专业人才的培养计划时，应当同步配置相应的教学课程、专业教师团队、教学设施及教材资源等，以确保人才培养的质量与效果。无论是国家专业目录的宏观调整，还是高校内部专业的增设与撤销，都要求对既有的教学资源进行相应的重构与优化。然而在实际操作中，教学资源的配套往往难以与专业的调整步伐保持同步，从而产生了“名改而实未变”的悬浮现象。具体而言，即便专业名称已经更新，但课程体系、教师队伍及教材资料等核心要素却仍维持原状，在现实中表现为课程体系的僵化、教师知识技能结构的陈旧、应试或灌输式教学方式的沿用，以及教材内容未能及时反映最新知识进展等方面。这些现象严重制约了专业调整的实际成效，使得人才培养的质量难以得到根本性提升。更为关键的是，如果专业调整未能带来教学内容的实质性更新，那么无论调整的形式如何多样，

都难以培养出真正符合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的高素质人才。因此,如何破解专业调整的悬浮性困境,实现教学资源与专业调整的同频共振,进而真正助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已经成为当前高校人才培养工作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三)组织困境:同质化发展与脱嵌式运行

以组织视角审视,我国高校在学科专业调整中面临着同质化发展与脱嵌式运行两大困境。其一,高校基于获取更多办学资源或提升办学地位的考量,在学科专业的设置上普遍呈现出“贪大求全”的倾向。这一趋势逐渐在高校间形成了一种发展“共识”,导致“人才培养模式与专业设置趋同”,进而加剧了高校内部发展的同质化现象。为便于学科专业的设置与管理,高校往往倾向于选择建设成本相对较低的文科类专业。在招生环节,部分高校则忽视了生产力发展的实际需求,盲目扩招,不仅导致教育质量的下滑,还培养出了大量与行业、企业实际需求脱节的毕业生。这种单纯从高校自身利益出发的有限理性发展理念,使得众多高校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失去了自身的特色与优势,发展路径趋于同质化。在新质生产力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这种同质化的学科专业设置未能有效契合市场发展的实际需求,其衍生的问题日益凸显。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的是在各行各业中具有先进性、创造性的解决方案,需要的是多元多样的复合型、创新型人才。而在旧有学科专业调整思路下的高校,其所进行的科学研究陷于“象牙塔”中,大多为了基金资助、论文发表、职称评定等,难以满足行业企业的知识技术需要。其所培养的人才大多陷入了“分数至上”的漩涡,进行无效的“内卷”,成为耶鲁大学教授威廉·德雷谢维奇口中“优秀的绵羊”,影响了高校的社会声誉与新质生产力的长远发展。因此,如何打破同质化的发展困境,构建具有特色的学科专业体系,成为有效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议题之一。

其二,长期以来,我国高校的学科专业优化调整都缺乏行业企业的参与,校企合作难以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并走向脱嵌式运行的恶性循环之中。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时强调:“要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对接,加强以企业为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不断以新技术培育新产业、引领产业升级。”这一指示深刻揭示了在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的当下,企业深度介入学科专业的优化调整进程,并逐步占据主导地位的重要性。然而,面对经济发展对学科和专业提出的新要求,我国高校往往仍基于自身发展的需求选择学科建设方向,或针对培养过程中存在的不足,对人才培养方案进行修订。在计划体制下,由于计划需求的单一性,高校教学计划的修订更多聚焦于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而较少关注社会的实际需求。诚然,固有的学科专业建设路径具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和阶段性特征,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如今,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新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高校被赋予了更加重要的使命,即需承担起服务经济发展的责任,密切关注外部社会的需求,并将行业企业等外部主体逐步纳入学科专业调整与建设的各个环节之中。但在现实中,行业企业在高校调整学科专业过程中的参与度极低,几乎处于缺席状态。这一现象导致高校所进行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难以与生产实际需求相契合,进而削弱了行业企业参与高校人才培养、开展合作科研的积极性。这种恶性循环不仅加剧了“高校—行业企业”之间的脱节,还使得高校的学科专业优化调整进一步陷入脱嵌式运行的瓶颈中。

(四)政策困境：投入不足与配置不公

从政策的角度来看，资金投入是推动学科专业优化调整的关键因素。发展新质生产力亦需要提高资源要素的配置效率和质量。然而，许多高校面临着投入不足与配置不公两大问题，制约了它们在学科建设和研究创新方面的能力。一方面，资金投入不足直接影响了高校的教学质量。高校需要资金来更新教学设施、购买先进的教学设备以及提供高质量的教育资源。缺乏足够的资金，高校便难以维持和提升教学设施的标准，进而导致教学质量的下降。同时，资金短缺还会限制高校引进高素质教师的能力，影响师资队伍的建设，从而制约学生的学习效果和学术成就。此外，资金投入不足也严重制约高校的科技创新能力。科研项目需要大量资金支持，包括购买实验设备、材料以及支付研究人员的费用。资金不足导致科研项目难以启动，或在实施过程中因资金问题而中断，从而限制了科研成果的产出和学术创新。这不仅影响了高校在国际学术界的竞争力和影响力，也削弱了其科技创新的活力。实际上，资金投入不足还会限制高校与企业的合作。高校与企业的合作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一旦资金不足，高校便难以进行有效的技术研发和创新，从而影响与企业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不仅阻碍了高校科研成果的产业化，也制约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另一方面，我国高等教育资源的配置存在一定的不公平现象。地理位置、历史背景、政策倾斜等因素，导致了一些高校在资源配置上占据了明显的优势，而其他高校则面临着资源匮乏的困境。这种资源配置的不均衡，直接扩大了高校间的发展差距，也对整个高等教育体系的均衡发展构成了严峻挑战。资源集中在少数一线城市高校或重点高校，使得这些高校能够享受到更多的财政支持、优质的教学和科研资源，以及建设更高层次的师资队伍。相比之下，地处偏远地区或历史底蕴较浅的高校则面临着资金紧张、设施落后、师资匮乏等困境，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教学和科研需求。这种不公平的资源配置不仅使得优质教育资源集中在少数高校，也导致了这些高校能够吸引更多优秀的学生和教师，形成良性循环，从而不断提升其教育质量和科研水平。而那些资源较为匮乏的高校，在师资力量、教学设施、科研经费等方面都无法与之抗衡，往往陷入恶性循环，难以突破现有的困境。更为严重的是，优质资源的高度集中使得不同地区、不同层次高校之间的教育质量差距不断拉大，不仅加剧了地区间教育的不平衡，也影响了社会公平与教育机会的均等。

三、新质生产力背景下高校学科专业优化调整的推进路径

在新质生产力快速发展的背景下，高等教育的学科专业优化调整已成为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促进科技创新和经济转型的关键。随着社会需求的变化，传统的学科专业逐渐暴露出与新时代发展要求的脱节，迫切需要进行系统的优化与调整。学科建设、专业调整、组织运行以及政策支持等方面的协调创新，是推动高等教育改革、提升学科专业体系适应性与竞争力的重要路径。

(一)学科建设路径：从功利化到价值理性

在新质生产力的引领下，社会的生产力结构发生了深刻变革，传统的庸俗功利化学科建设思维已经无法满足经济发展对高素质、跨学科人才的需求。因此，高校学科的优化调整应从功利化导向转向更加符合社会长远发展需求的价值理性导向，即关注学科的社会价值、知

识传承与创新、人才培养的多样性与可持续性。

其一，在学科建设路径的转型过程中，要从学科设立和调整的理念入手，注重价值理性的引领。新的学科建设不仅仅要响应当下市场的需求，更要放眼未来，考虑学科本身对社会文化、科技进步及人类文明的贡献。学科设置不应只考虑专业的“就业热门”或“经济效益”，而应立足于更长远的发展目标。例如，面对科技变革与产业升级，学科建设要将创新思维与基础研究放在重要位置，推动交叉学科的发展与深度融合。生物医学工程、环境科学、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的学科设置，都要求高校从根本上摆脱单纯追求经济效益的功利化思维，转而关注对国家社会发展的贡献和对知识体系的完善。这种价值理性导向的学科建设，不仅有助于培养具备创新精神、跨学科能力的高素质人才，还能推动高校科研方向的深度探索与突破，满足社会对科技创新的长期需求。

其二，学科建设路径的价值理性转型需要在具体操作上进行深度优化。高校应根据社会发展趋势与国家战略需求，在学科规划与专业设置中寻求一种动态平衡，避免过度依赖市场化的短期需求，强调学科的文化价值、历史传承以及人文学科的重要性。在全球化与信息化的背景下，学科建设不仅要聚焦于科技创新，还应充分关注文化、伦理与人文精神的传承。例如，社会学、哲学、历史学等传统学科的价值在今天依然不可忽视，它们对培养具有全球视野、批判性思维和跨文化理解能力的人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此基础上，高校应加强学科间的协同与融合，探索学科边界的交叉与重构。这不仅能够为学生提供更加广泛的学术视野，还能够促使高校的教学与科研更加符合时代需求，推动教育与社会发展深度契合。在这种转型的过程中，高校要通过优化资源配置、调整课程设置、加强跨学科团队建设等措施，逐步实现从功利化到价值理性的学科建设路径转变，为未来的社会发展培养更加全面、创新和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才。

(二)专业调整路径：从悬浮性调整到实质优化

在新质生产力的推动下，高校专业调整的核心应从“悬浮性调整”向“实质优化”转变，以适应新质生产力带来的深层次变革。“实质优化”强调专业调整既要考虑市场和就业需求，又要兼顾学科的内在逻辑、学术深度和社会长远需求。

首先，在专业的设置与调整方面，高校必须从国家或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和人才需求的全局出发，进行更为精准和系统的长期战略规划，在专业设置上进行系统化、规范化的设计。具体而言，高校可依托大数据分析、行业调研以及与企业、科研机构的密切合作，精准把握未来产业需求和科技趋势，同时结合国家发展战略和地区特色，科学配置资源，循序渐进地推进专业调整的多元化与深度化，杜绝以急功近利的思想反复对专业进行增设与裁撤。需要强调的是，专业调整在重视外部需求的同时，应与学科内涵建设和教育质量提升密切结合，确保新设立的专业在本校有扎实的学科基础支撑，而非跟风设置所谓“热门”专业。虽然适应市场需要和学生学习需要的“热门”专业能更好地服务学校的招生工作，但有相关学科基础支撑的专业才能真正培养出社会所需的，尤其是新质生产力领域所需的具备核心竞争力和创新能力的人才。

其次，在专业建设与管理方面，高校应通过建立灵活的课程体系和育人机制，推动专业

的实质性优化。课程是专业人才培养的重要载体，新专业的建设需要配套进行课程改革。在课程设置上，应当破除传统的以教师教学能力为起点的设置逻辑，建立起以专业人才培养需要为起点的设置逻辑。课程的改革方向应当锚定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能力结构，尤其是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所需要的具体能力与素质要求。课程的改革内容应当深入知识技能结构、教育教学方法、相应教材更新等实质性要素，由点到线到面，推动课程体系的整体性优化，支撑专业建设。此外，在相应的管理方式上，高校也应当积极破除改革过程中的制度惯性。例如，更大范围地打通学生选课、转专业、主辅修和双学位的堵点，为学生提供更广阔的学习平台和更广泛的研究机会，以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所需的复合型创新人才需要；改革教师教学管理制度，发挥教师发展中心的作用，以管理制度改革倒逼教师自我提升，以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为专业教学带来的变化。只有采取这些实质性的优化措施，高校才能真正实现专业调整的目标，将我国高等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的人口红利转化为人才红利，服务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三）组织运行路径：从同质化到特色发展

新质生产力要求强调创新驱动与个性化发展，推动高校不仅要在学科设置上有所突破，还需在组织管理、学科发展战略上走出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因此，推动高校学科专业的优化调整，必须从“同质化”模式向“特色发展”路径转变，形成以特色为核心的组织建设和管理体系。

其一，推动高校的特色发展，意味着要从整体战略高度重新审视和确定高校学科与专业的定位。高校应结合自身的资源优势、地域特点和发展方向，制定差异化的学科规划，明确其在新质生产力背景下的战略定位。例如，一些地方院校或有历史文化底蕴的高校，可以通过挖掘和深化特有的学科资源，发展文化、艺术、历史等领域的特色学科；而一些具有科技创新潜力的高校，可以在人工智能、新材料、生物医药等前沿科技领域展开特色化布局。通过对优势学科的深度开发和对特色学科的战略培育，高校可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创造出独具地方特色和学科特色的学术品牌。另外，高校还应注重形成有特色的学科群体，通过整合不同学科资源，推动跨学科合作与协同创新。比如，某些高校可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核心，发展智能制造、智慧城市等特色学科群。这不仅有助于提升学校的整体竞争力，也能够实现行业和社会需求的高度契合。高校从单一的“学科设置”向“特色化发展”转变，有利于打破同质化困境，寻找到与自身发展优势相匹配的独特定位，形成个性化的学科生态。

其二，要实现从“同质化”到“特色发展”的转变，高校必须在组织和运行机制上进行系统性改革，建立更加灵活、动态和富有前瞻性的学科建设和管理机制。这不仅涉及决策层面上的支持和引导，更需要在具体的教学、科研和评价体系等方面进行调整。例如，高校可以通过设置学科发展基金、建立跨学科研究平台等方式，为具有创新潜力和特色化发展的学科提供充分的支持与保障。同时，高校还应鼓励教师在学科发展中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给予跨学科合作的激励机制，推动教师群体的多样化发展。高效的组织运行机制应当能够有效调动全校资源，整合各类人才与资金，促进学科之间的深度合作与融合，激发学科发展的创

新活力,进而推动特色学科的快速成长。此外,高校应建立以成果导向为核心的评价体系,强化学科发展过程中的反馈机制。通过不断评估学科发展中的关键问题与薄弱环节,高校可以及时调整发展战略,确保特色学科始终处于创新前沿。高效的组织和管理能够为特色学科提供长期稳定的发展环境,避免走向短期化和形式化,确保特色学科能够在竞争激烈的教育生态中生根发芽。

(四)政策支持路径:从制度保障到资源配置

政策保障是实现高校学科专业优化调整的基础,能够为学科的战略定位、优化调整以及创新驱动提供必要的法律、制度和资源支持。当前,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传统的教育体制和学科设置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已无法满足新兴产业和技术变革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因此,政策层面的支持尤为重要。从制度保障到资源配置的政策支持路径,不仅可以有效推动学科调整,还能促进高等教育创新和人才培养的高质量发展。

其一,从制度保障的角度来看,国家和地方政府应加强教育体制改革,建立起适应新质生产力要求的学科发展和管理制度。新质生产力强调科技创新、知识更新以及跨学科的协同发展,因此,现行的教育体制和学科管理方式亟须进行调整,强化对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的支持。具体来说,政府应出台一系列有利于学科优化的政策,推动学科评估标准的更新,适应产业发展与社会需求的变化。例如,可以加强对高新技术领域、人工智能、大数据、绿色能源等战略性新兴学科的政策引导,设立专项资金或税收优惠,鼓励高校将重点资源投入这些领域的学科建设中。此外,政府应在学科发展规划中增加前瞻性和灵活性,避免“一刀切”的政策导向,尊重高校的自主办学权和学科特色。通过加强制度保障,政府可以为高校提供更宽松的环境,使其能够根据社会 and 市场需求灵活调整学科专业设置,推动高校学科由传统单一模式向多样化、特色化发展。

其二,资源配置是政策支持路径中的核心环节,有效的资源配置可以为学科优化调整提供直接的支持,推动高校提升教育质量和科技创新能力。政府应通过资金支持、人才引进和科研资源配置等方式,帮助高校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一方面,政府可以加大对重点学科的资金投入,特别是那些符合国家战略发展需求的学科。例如,针对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可持续发展等前沿科技领域,政府可以设立专项资助计划,推动高校集中力量开展相关领域的研究与人才培养。在此过程中,在保证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还应鼓励高校拓展与产业界的合作,提升学科的应用价值和创新能力。此外,政府可以通过出台税收优惠政策或给予科研设备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的补贴,促进高校在特色学科领域的长期发展。另一方面,资源配置的优化还包括人才的引进和培养,新质生产力要求高校能够培养出具备创新精神和跨学科能力的高层次人才,因此政策应鼓励和支持高校通过国际化的人才引进机制、科研合作平台和灵活的职称晋升制度,吸引一流的科研人员和教师。在此基础上,政府可以通过专项政策支持高校开展跨学科的教学与研究,尤其是在新兴领域和交叉学科中,推动高校加强与社会和企业的深度合作,促进学科的多维发展。资源配置的优化,最终目标是通过政策支持使得高校能够有效地调动现有资源,推动学科专业的优化调整,从而更好地适应新质生产力的需求,培养创新型人才,推动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四、结语

在新质生产力背景下，高校学科专业的优化调整不仅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高等教育深化改革、提升教育质量的关键所在。学科与专业的调整应紧密依循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价值导向，聚焦创新驱动、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的深度契合。然而，在这一过程中，高校学科专业调整面临着功利化、悬浮性调整、同质化发展投入不足等多重实践困境，需要在价值导向与现实需求之间找到平衡，灵活应对挑战。未来，推动高校学科专业优化调整的路径应从长远视角出发，既要坚持学科的独立性和学术性，又要积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需求，培养符合未来发展趋势的复合型人才。通过科学规划、合理布局以及机制创新，高校将能够在新时代的浪潮中，发挥学科专业的引领作用，为国家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贡献力量。高校学科专业的优化调整不仅是学术领域的自我革新，更是履行社会责任、彰显使命担当。唯有在价值遵循的基础上克服实践中的种种困境，高校才能实现学科建设的长远可持续发展，培养出更多适应社会发展需求、具备创新能力与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为推动社会进步与国家繁荣奠定坚实基础。(本文摘自《大学教育科学》，2026年第5期)

“顶天立地”设置调整高校学科专业

在科技创新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关键要素的今天，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关键在于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目前，我国在人才资源总量、研发人员规模上已居世界前列，但科技和产业领域的人才队伍建设存在明显的结构性矛盾，具体体现为核心领域人才供给不足、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匮乏以及高技能人才储备短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健全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机制”。高校应进一步以科技发展、国家战略和市场需求为牵引，“顶天立地”设置调整学科专业，创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调整机制，大力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及相关人才培养。

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服务国家战略需求

所谓“顶天”，就是以服务重大战略需求为根本遵循，瞄准国家急需和科技前沿。

高校学科专业设置调整应充分体现教育的战略属性。一是增设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短期需求激增的学科专业。加强战略性学科系统部署，发挥国家重大战略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叠加效应，面向国家急需关键技术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建立快速响应机制。精准对接人工智能、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等人才急需领域，通过“揭榜挂帅”等方式动态增设优化相关专业，提升学科专业供给的时效性与适配性。通过学科筑峰、学科集群建设、学科资源倍增等举措，推进国家战略急需学科专业的高质量发展及其内涵建设。二是增设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需求不确定的新兴学科专业。瞄准未来科技革命制高点与潜在颠覆性方向，设立学科前沿探索基金项目，搭建未来学科孵化平台，实现学科专业适度超前布局与战略储备，占据一流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制高点。尤其要注意通过交叉融合发展新兴学科专业。“双一流”高校要胸怀“国之大者”，面向国家战略必争领域、新兴产业领域、冷门紧缺领域、民生急需领域等加强交叉学科专业建设。三是增设人才需求相对稳定

学科专业。以学科专业优化为突破口,遵循学科建设内涵与发展规律,聚焦人才需求相对稳定的学科专业、基础学科核心领域以及人文社科关键方向,培厚学科基础,注重内涵式高质量发展,打造新的学科增长点。同时,构建兼顾存量优化与增量改革的动态化结构调整机制,既要注重存量优化与增量布局相结合,又要完善学科专业的准入与退出机制。此外,针对学科专业增存量改革优化中的跨学科、超学科的学科交叉融合特点与趋势,须依据高校基层学科组织的变革与迭代发展推进学科交叉融合,以问题为中心打破传统学科组织间的无形藩篱,以动态协作网络取代静态学科割据,重构面向复杂性问题的知识生产共同体。

所谓“立地”,就是以响应市场需求为重要导向,把为产业创新提供高素质人才支撑与毕业生高质量就业高度统一起来。

学科专业动态调整要协调国家、区域战略和市场等多方主体需求,形成政府、高校等设置主体协同的学科专业设置调整治理格局,根据科技发展趋势,以国家、区域战略和市场需求牵引明确学科专业设置调整的方向。一是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学科专业。区域向度是当代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时代特征,尤其对于地方高校而言,要结合所在区域资源禀赋找准自身定位,锚定区域产业需求,依据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增强学科专业设置调整的适配性,激活区域特色学科优势,实现学科专业设置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有效联动。二是科学有序发展热门学科专业。针对目前学科专业建设出现的“热点追逐”现象,要做好人才需求的预测预警信息发布,同时加强师资力量、课程体系、实践平台等学科专业建设支撑保障,确保新增学科专业的办学质量。三是要根据产业发展特点及劳动力市场的实际需求,健全完善国家人才供需对接大数据平台。紧紧围绕国家战略及国民经济生产力布局,聚焦数量规模、结构布局、能力素养的适配,引导高校调整优化学科专业结构。最终使高校学科专业设置调整服务于产业发展与创新,助力毕业生实现高质量就业。

此外,还要实现“贯通”,即“顶天”“立地”一体布局,推动学科专业建设有效嵌入教育链、创新链、人才链、产业链。

学科专业是教育链、创新链、人才链、产业链的结合点。要加强高校学科专业的链式协同,建立与高校分类改革相适应的学科专业调整机制。在差异化推进基础类、应用类、战略类学科专业布局建设的同时,加强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高校之间和同一类型高校内部可能存在的基础类、应用类、战略类等学科专业的衔接与对接,并统筹同一学科专业的本、硕、博各学段学科专业布局,在此基础上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

创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调整机制

高校学科专业设置调整本质上是高校资源的配置与再配置,而高校资源配置必然涉及政府、市场与高校三者的关系问题,其中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市场从广义的需求侧而言,包括科技发展需求、国家战略需求和市场需求;高校包括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各类型高校。

新时代高校学科专业设置调整必须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一是充分运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资源配置中的有效作用,发展牵引高校学科专业设置调整的有效市场;二是高校学科专业设置调整离不开有为政府,要充分发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在高校学

科专业设置调整中的主导作用，强化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资源统筹、评价联动，健全教育科技人才战略统筹实施机制，加强战略目标有机衔接、战略任务一体部署、政策措施协调发力，努力打造有为政府，更好发挥科技发展、国家战略和市场需求对高校学科专业设置调整的引导作用。例如，创新学科专业目录管理机制，缩短调整周期，加强研究生、本科、高职三类学科专业目录协同联动；完善分类发展机制，差异化推进基础类、应用类、战略类学科专业布局建设；改革评价考核机制，强化人才培养中心地位，完善促进高校学科专业特色发展的多元评价体系；优化激励引导机制，统筹招生计划、超长期特别国债等政策，持续优化学科专业结构。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还体现为二者在高校学科专业设置调整方面的相辅相成。一方面，市场牵引高校学科专业设置调整的有效性，助力政府从宏观层面科学规划、精准布局，成为真正的有为政府。另一方面，政府“有为”又体现在充分且善于运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使市场需求真正成为牵引高校学科专业设置调整的有效市场。如健全供需对接机制，建设国家人才供需对接大数据平台，为高校学科专业设置调整提供科学依据和方向指引。

作为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主体，高校既是行动主体，也是承载主体。没有高校的主动作为，政府的有为和市场的有效便无从谈起。这要求进一步落实和扩大高校自主权，其中，学科专业发展自主权是核心要素。例如，向高校下放高职、本科专业及研究生教育二级学科专业设置自主权，加大动态调整力度，完善自主审核制度，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高校学位授予体系、专业目录体系和管理制度。只有把高校这个“双主体”的主动性能动性调动起来、自主权落实到位，才能切实促进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本文摘自《光明日报》，2026年4月28日第15版）

高校学科专业调整不能只做“加减法”

新技术突破、产业转型和就业结构变化，正在推动高校学科专业进入密集调整期。及时增设经济社会急需专业、调整需求不足专业，是高等教育主动适应发展变化的必然选择。然而，如果把调整简单理解为“热门专业做加法、冷门专业做减法”，就容易以专业目录的可见变化代替人才培养能力的深层变革。学科专业调整表面上改变的是名称、数量与招生规模，实质上重组的是知识结构、师资能力、课程体系和办学资源。真正需要调整的不是一张目录，而是大学回应外部变化的能力。

专业目录是“快变量”，培养能力是“慢变量”。专业是高校连接知识体系与社会需求的重要接口。产业出现新的技术方向和岗位需求，高校可以通过增设专业、调整招生和更新培养方案作出回应。但目录调整具有较强的行政可操作性，一个专业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完成申报、审批和更名；而支撑专业运行的教师知识、课程内容、实验条件、实践网络与质量文化却需要长期积累。前者是能够迅速改变的“快变量”，后者则是难以在短期内形成的“慢

变量”。当目录变化快于能力建设，新专业便可能只有新的名称，而缺少新的知识结构和培养方式。

这种快速变革决定了学科专业调整不能等同于岗位需求的即时响应。产业需求具有波动性，一项技术从快速扩张到趋于成熟，可能短于一个专业从筹建到毕业生进入市场的周期。学生依据当下的“热门”选择专业，四年后面面对的可能已经是另一种技术和岗位结构。学科专业建设还须有明确的路径依赖：师资引进、实验室建设、教材开发和实践基地形成都包含较高的沉没成本，一旦布局，便难以频繁转向。若高校试图精确追随每一个产业热点，不仅可能始终落后于市场变化，还会因反复调整消耗有限资源，破坏知识积累的连续性。教育当然需要回应现实需求，但大学并不是岗位培训的简单前端。其更重要的任务，是把短期岗位需求转化为相对稳定的知识基础、方法训练和迁移能力，使学生能够适应尚未出现的职业。产业变化越快，高校越不能只培养对应某个具体岗位的人。

“加减法”调整可能制造新的结构性失配。首先是时间错配。就业数据和产业需求通常反映已经发生的变化，专业调整和人才培养面向未来。若仅依据某一年度就业率、招聘数量或产业热度决定专业进退，容易把短期波动误判为长期趋势。一些专业当前就业表现不佳，可能源于经济周期、区域产业结构或培养质量，而不必然意味着其知识领域已经失去价值；一些新兴专业需求迅速增长，也不意味着所有高校都具备相应办学条件。用过去的调整面向未来的培养结构，本身就需要保留必要的判断空间和制度缓冲。

其次是组织趋同。人工智能、集成电路、低空经济等领域受到关注后，不同层次、不同区域和不同办学定位的高校可能同时追逐相近方向。表面上看，新兴专业不断增加，实际上可能只是传统专业的同质化转移到了新的赛道。研究型大学、应用型高校和地方院校承担的功能不同，所处区域的产业条件也不相同。如果根据同一份热门专业清单调整布局，不仅难以形成特色，还可能造成师资争夺、设备重复建设和毕业生供给集中。学科专业结构是否合理，不能只看某个专业是否“先进”，还要看它是否与学校能力、区域需要和人才培养层次相匹配。

更深层的原因是知识生态失衡与办学能力空心化。大学知识体系具有内在关联，新兴技术的发展同样离不开数学、物理、哲学、历史、语言等基础与人文学科的支撑。如果把市场需求较弱简单等同于知识价值较低，就可能削弱那些规模不大、回报较慢但不可缺少的知识领域。与此同时，专业名称可以更新，教师却未必完成知识转型；培养方案可以重写，课程内容和实践条件却可能仍然停留在原有水平。一旦出现“旧师资讲新专业、旧课程装新概念、旧资源支撑新方向”，专业调整就会从结构趋同转向能力空心化。由此形成的并非供需适配，而是新的结构性失配。

从专业增减转向培养能力重组。破解“加减法”思维，首先，要从追求精确预测转向增强结构弹性。产业和技术变化难以被长期准确预测，高校不应把全部资源押注于少数即时热点，而应在稳定基础知识结构的同时，提高课程和培养方案的可调整性。相比频繁增设或撤销整个专业，可以更多通过专业方向、课程模块、微专业和跨学科项目回应新增需求，使学生在保持学科基础的同时形成新的能力组合。需要退出的专业也不宜简单“一撤了之”，

而应设置转型期，通过课程重组、师资转向和资源共享，将已有办学积累转化到新的培养领域。

其次，要从统一跟随热点转向分类布局。研究型大学可以依托基础研究和学科交叉布局前沿领域，重在形成新知识和新方向；应用型高校应更多结合区域产业和真实场景重组专业，突出技术应用与复杂问题解决；地方高校则需要与服务区域发展与保持办学稳定性之间寻找平衡，避免在缺乏师资、平台和产业支撑的条件下盲目追新。专业设置的评价标准也应由“有没有”转向“能不能办好”，重点考察师资结构、课程质量、实践条件、学生发展和持续改进能力。只有与学校定位相匹配的新专业，才是真正有效的结构调整。

最后，要从事后淘汰转向全过程监测。就业率可以作为专业调整的重要依据，却不能成为唯一依据。国家层面应加强技术、产业与人才结构的长期趋势研判，为学科专业布局提供方向性信息；区域层面应结合产业基础和人口变化识别人才需求，避免相邻高校重复布局；高校则应持续跟踪课程运行、学生发展和毕业生去向，判断问题究竟来自经济周期、培养质量还是结构性需求下降。监测的目的不是用数据自动决定专业生死，而是为增招、限招、预警、转型和退出提供差异化依据，并为必要的长周期知识领域保留制度空间。学科专业调整的真正成效，不在于增设了多少“新专业”、撤销了多少“旧专业”，而在于能否形成与知识演进相适应、与产业变革相衔接、与学生长远发展相一致的结构性能力。专业目录可以做加减法，大学的知识生态和育人能力却必须进行系统重构。（本文摘自《中国社会科学报》，2026年9月1日第08版）